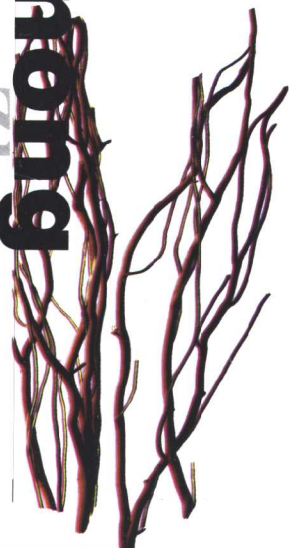


Sannong

Zhongguo



三农视野/农村土地/农民负担/税费改革/乡镇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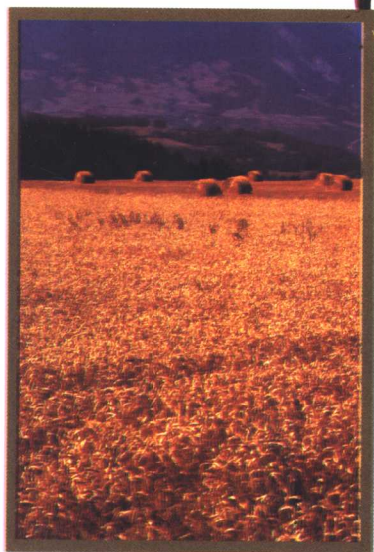
三农解析/政策建议/谈古论今/农民生活/政策评论

三农数据/我为农民鼓与呼/对立观点/三农人物

SANNONG ZHONGGUO

三农中国

徐 勇 ●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SANNONG ZHONGGUO

三 农 中 国

农中国

主 编：徐 勇
执行主编：董磊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农中国/徐勇主编.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16-03800-2

I. 中…

II. 徐…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②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670 号

三农中国

徐 勇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安陆市鼎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33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500

定价:10.00 元

书号:ISBN 7-216-03800-2/F·67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三农中国》编委会

- | | |
|-----|----------------|
| 徐 勇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项继权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吴 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贺雪峰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孙秋云 |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
| 钟涨宝 |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
| 柏贵喜 |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
| 温铁军 | 《中国改革》主编 |
| 李昌平 | 《中国改革》(农村版)副主编 |
| 朱苏力 | 北京大学教授 |
| 王铭铭 | 北京大学教授 |
| 姚 洋 | 北京大学教授 |
| 张 静 | 北京大学教授 |
| 秦 晖 | 清华大学教授 |
| 孙立平 | 清华大学教授 |
| 仝志辉 | 清华大学博士后 |
| 张 鸣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程漱兰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洪大用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白南生 | 国家体改委研究员 |
| 韩 俊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 赵树凯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 陆学艺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党国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樊 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于建嵘 |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张乐天	复旦大学教授
张佩国	上海大学教授
毛 丹	浙江大学教授
周晓虹	南京大学教授
金太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郭正林	中山大学教授
吴重庆	广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董建辉	厦门大学教授
卞 利	安徽大学教授

目 录

三农大视野

温铁军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1
何新	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7
孙立平	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新变化	19

农村土地

秦晖	“优化配置”? “土地福利”?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	30
方正伟	自留地:外出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41

农民负担

张德元	农民负担与干部负担	45
彭代彦	“三农”问题之我见	49

税费改革

张鸣	也谈“黄宗羲定律”	55
----	-----------------	----

乡镇治理

党国英	乡镇机构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61
邓大才	当心乡镇财政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66

三农解析

李昌平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是怎么被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	------------------------	--

消耗掉的	71
张庆国 农村妇女高自杀率的原因 ——一个实证社会学的视角	77
何慧丽 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84

政策建议

曹锦清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91
孙振军 啥时建“老农民活动中心”	97

谈古论今

姚洋 城乡差距,差在哪里	99
张佩国 “何不食肉糜”与乡土社会的逻辑	104

农民生活

全志辉 游村的电话	108
梁振平 由翻译想起的	111

政策评论

赵树凯 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 ——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	115
程漱兰 政策规定与实际执行的反差 ——2003年“两会”期间应媒体之约对上届政府的一点 评价	126

三农数据

吴永亮 统计数字的十大变数 ——部分县市采访札记	130
-----------------------------------	-----

我为农民鼓与呼

郭正林	善待老农.....	134
邹顺桥	赵芳:中国农民:谁为你哭泣.....	139
舒先礼	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随想.....	147

对立观点

王晓毅	小岗村的悖论.....	151
于建嵘	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	155

三农人物

张晓冰	解读李昌平.....	160
-----	------------	-----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温铁军

一个战略命题：中国问题——农民问题

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 20 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 20 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

温铁军：《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

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表示,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然而,这种清醒的认识并没有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预想的道路前进,简单的说,就是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被中国的决策者所选择。问题不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受外来影响,认识产生了变化,而仍然是由于本土的现实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威胁,6月中国参战,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再靠“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美军抗衡的,因此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

装备的苏式化必然促使军事管理制度的苏式转变,军队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苏化致使上层建筑的苏化,进而影响经济基础的苏化,加上战争的需要,开始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建设。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了部分工业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对中国重工业建设的支援,援助 156 个重点项目。但革命战争后进城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根本无法管理现代的工业经济,只有在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全盘接受苏式的工业经济思想。东北的小计委搬到北京,变成了国家计委,苏式的工业经济管理思想从东北扩展到全国。1953 年国家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终结了。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因应这种国际形势改变而改变的,是客观必然的结果。

显然,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苏式工业化以重工业体系建设为先,而且采取忽视这个产业间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要农民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了。地主阶级被打倒,使农业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约 2000 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 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

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中国尤其是农民为这种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有时还不够,直至发生3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在只有基本生活资料的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入分配,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呼隆”的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1952年到1977年间的国家工业化中,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但是,对这种工业化道路负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为根本否定这个时期的理由。

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正是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据有关统计,1979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这是客观的事实。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

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农民问题:就业危机

综观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账。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

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4千万人的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就业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

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完全脱离农业。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还有4亿4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千万~8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不解决,国无宁日。

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密切相关的。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他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

何 新

我曾经说过，中国很少有真正懂得真实经济过程的理论经济学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饱读经济文献的经济学博学者。但是，经济现象并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中演绎出来的。相反，检验经济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模型。应看其是不是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可验证的预测以及有效的对策。

十几年前，当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生产过剩”时，不仅当时曾受到所有经济学家的一致斥责，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理解“过剩”并非意味着“富有”。对于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生产过剩”是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已应抛弃的过时概念。但是今天，面对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我相信已经没有经济学家（包括当时嘲笑我的人）敢否认这个概念了。

在此文中，我想再提出一个在主流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地租”概念，并且说明这个概念将可以如何有效地解释当前国内经

何新：著名学者，研究员。

济生活的一部分重大现实。

近一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在湖北乡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当前农村中“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但是,在这种讨论中,迄今却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租问题以及相关的地租利得流向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

二

地租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工资、利润、地租是国民经济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劳工、资本家、地产主。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资本论》第三卷,第701页。)地租表现为地产所有者向市场提供一块土地所取得的经济收益。马克思曾指出,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地租会参与资本的形成。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几乎不谈地租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重要概念被取消了。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无知于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在1997年3月发表的一个经济报告中曾指出现代经济中地租范畴的存在:

“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

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参阅《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第516页。)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这是第一次重新提出并探讨了伴随土地私有化过程发生的资本性地租问题(我在1989年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力过剩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指出中国应警惕金融危机以及泡沫问题,1999年指出失业问题不容忽视以及廉价劳动力是增长源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当前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以及当前为各界所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房地产及金融业泡沫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深刻而密切的关系。

三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之一体现在城市基本建设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路桥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方面。经常去欧美城市访问的人会发现,除少数新兴地区以外,城市基本面貌和交通设施,自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迄今很少有重大变化。而中国则不同,城乡建设及路桥设施日新月异。

为什么中国城乡面貌的建设与变化能够如此之快?在资本投入量远远小于欧美的前提下,其发展速度为什么竟能大大快于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公认的答案是:中国国内工程造价低廉,基础设施及路桥建设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但是,人们却很少意识到,造成这种成本低廉的原因,除了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这一点以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土地使用费用即地租的低廉问题。因为在一切建筑物以及交通设施建设成本中,除人工费用、技术费用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地费价格,亦即地租(一般来说,生产成本由人工费用、技术设备费用、土地费用、资金费用和原料费用五项构成)。